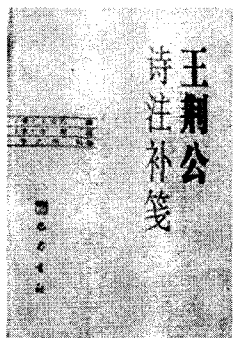


# 莫把“贡禹”改“禹贡”

——评李之亮《王荆公诗注补笺》的疏误

高克勤



李之亮教授近二十多年来在宋代文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辛勤耕耘,成果惊人。仅2000—2004年,他就出版了有关宋代文史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26种1400余万字,2005年又出版了《王荆公文集笺注》(210万字);仅在巴蜀书社,他出版的上述著作就有近1400万字之巨(据《王荆公文集笺注》附录,巴蜀书社2005年5月第1版)。他的这些著作,我大都没有读过,无法作评价,仅因研究兴趣所在,拜读了署名“宋李壁注、李之亮补笺”的《王荆公诗注补笺》(巴蜀书社2002年版)。此书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据朝鲜活字本影印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作校勘的工作底本,不出校记;补入清人沈钦韩的补注和近人刘承干的辨正文字,以及整理者的补笺。此书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全书约百万字,凡1066页。需要肯定的是,整理者对此书用力甚勤,在校点中能校勘出底本的一些明显错讹之处并改正,补笺也间有发现之功。但是,全书存在着大量的编校错误,包括错字、原注脱漏、标点错误等,反映出整理者在文史知识方面的匮乏和学风的浮躁,令人简直不能相信此书出自一个有着长期古籍整理经历且又著作等身的学者之手。鉴于此书为目前朝鲜活字本影印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的惟一整理本,为不使此书误导读者,同时也为了抑制古籍整理工作中出现的粗制滥造的现象和浮躁的学风,特不避琐碎之嫌,将此书的疏误归纳为几个方面,举要揭出,敬请读者明鉴。

全书排错之字数不胜数。目录第2页就有错字,《再见前韵寄蔡天启》中,“再见”应作“再用”。仅以正文前100页计,错字就有数十处之多。兹罗列于下:

第8页《题徐熙花》注2“槃礴媚”,应作“槃礴羸”。此诗有“安知有人槃礴羸”句。

第13页注12《庄子》:“孔子曰:‘……而立游方之内者也。’”“立”应作“丘”,孔子自称其名。

第17页注23《北梦琐言》:“……力小致惑者。”“惑”应作“毙”。

第31页注1中“辅公佑”,应作“辅公祐”,辅为隋末人。

第44页注19中“雅原未就”,应作“雅意未就”。

第46页注47中“长安王陵”,应作“长安五陵”。

第52页第2行“便与对己策”,“己策”,应作“匕筴”。

第54页注35中“诗又云‘韩输’”，正文诗作“诤输”，排误。注43、44中三处“博弈”之“博”，均误作“搏”。

第66页《雁》注2杜诗：“舍山舍北皆春水”，“山”应作“南”。此为杜甫诗《客至》首句。

第67页《对棋与道原至草堂寺》次句“清坐且者与君棋”，“者”应作“可”。

第73页注5《太平广记》：“……其家不施明限，虑伤马也。”“明限”应作“门限”。

第77页《古意》注6中“水又漫于往者”，“漫”应作“浅”。注8中“客至，对坐悒悒不乐”，应作“客主对坐，悒悒不乐”。这一句因排误，导致标点也误。

第80页《独归》注4中“冷然善也”，“善”应作“喜”。注5“有人”，应作“前人”。

第89页注11中“悦谢安青山”，“谢安”应作“谢家”。

第93页《次韵舍弟江上》注1中“李侍郎弥远”，应作“李侍郎弥逊”。李弥逊为宋人，宋高宗时曾试户部侍郎，《宋史》卷三八二有传。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编校粗疏导致的错误之多，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甚至是一些电脑误植的乱码也未删去，而保留在书中。如第48页注13末“许由”句号后多一“惭”字。第111页注9“欧公诗”排成了“鹈饭」并谎”，还莫名其妙地多出一个符号。

## 二

由于本书是简体横排，所以在繁简转化中出现了不少差错，造成了一些错字。例如第560页《和微之重感南唐事》注5中叙陈后主叔宝事，原文作“叔瑤”，“瑤”即古文“宝”字。整理者不识“瑤”字，又不加思考，两处都竟将“叔宝”误作“叔瑤”。又，第718页《送明州王大卿》注2中“闻三公车辐尽作鹿”，“尽”应作“画”。尽、画繁体字形近，故有此误。

此外，从古籍整理保留原貌的角度而言，人名、地名、书名等专名，简繁体字并存时应尽量保留原貌，不能混用，以免引起歧义。而本书在这方面将专名一律作简体，是有欠缺的。如第27页《示张秘校》注1、第406页《次韵唐公三首》注1、第431页《和唐公舍人访净因》注1等处，都将“张瓌”排作“张瑰”。再如第43页注13，第142页注3、注4等处，都将《寰宇记》、《寰宇志》排作《环宇记》、《环宇志》。有些异体字也是如此。如第49页注17：“秦以罪似皇字，改为罪。”前一“罪”字，原文作“辜”，现统一简化为“罪”，就令人不知所云了。

## 三

全书存在着大量的脱漏，不仅有一字一词的脱漏，更有一句一行甚至大段的脱漏，不能完全反映原书的本来面貌。例如目录第3页，《移桃花示俞秀老》中漏“移”字。仍以正文前100页计，脱漏也有十余处之多。兹罗列于下：

第23页注5“多士缙珽”句中漏“珽”字。

第32页《鸾碣》注2“木自毙曰斃”句中漏“木”字。

第49页注23“退之作《石鼓歌时在东都歌》”，前一“歌”字漏。

第54页注44“牧猪奴戏耳”句中漏“耳”字；注45漏注码和“扬子或问”中的“扬子”两字。

第61页注5“梵语跋陀婆罗”句中漏“婆”字。

第62页注8“今当示汝无所还地”句中漏“无”字；庚寅增注“有世界名曰”句中漏“曰”字。

第73页注5《太平广记》“……后三复乘马”句中漏“三复”两字，此出《太平广记》卷三八七《刘三复》条。

第89页注11中“时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句中漏“二十”两字；又，“以其地近而

言之耳”句中漏“近而”两字；注16中“畔援，犹跋扈也”句中漏“畔”字；注17中“既见温”句中漏“温”字，不到半页仅十行注中，就漏了四处六字。

第95页注20中“为赋相灌输”句中漏“为赋”两字。

需要指出的是，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中李壁注、补注、庚寅增注三部分是分开排列的，整理者为了使全书眉目清晰，对全书的注释作了调整，将各类注评依次排列在一起，应该说这一出发点还是不错的，但是整理者的这项工作做得非常粗疏，补注、庚寅增注部分大量脱漏。如第100页注17中庚寅增注：洙泗间：朱文公云：“《汉书》：‘鲁有圣人之教化，濒洙、泗之水，其民俗既益薄，……’”“濒洙、泗之水”后漏“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两句。同页注22“逃其间者”注后漏庚寅增注两条：《庄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文中子》：“天地之间，吾得逃乎？”

#### 四

如果说错字、原注脱漏等还可归咎于“手民”之误和校对疏忽的话，那么，全书存在的大量标点错误，就完全是整理者的责任了。这些错误不仅是因为整理者文史知识方面的匮乏，更是学风浮躁所致。例如：

第19页《示元度》中“不求鹑雏实”，鹑雏是鸟名，“鹑雏实”是鹑雏的食物，应连读。注7整理者却标点成：“鹑雏，实言梧桐、竹之类。”

第28页注3引《元次山集·心规》云：“……里夫公闻之……歌已矣夫，公曰……”“夫公”为专名，应连读。

第49页注17中“秦以罪似皇字，改为罪臣。铉曰：……”“臣铉”为徐铉自称，应连读。

第53页注2：“楚有叶公，诸梁食采于叶，僭称公。”诸梁为叶公之名，叶公即诸梁，为同一人，不可断开，应连读。

第81页注1：《华严经》：“起信抄中……”应作《华严经起信抄中》。整理者误将书名断开。

第189页注8：别本“之而”作“文披”，误甚。此条注是对王安石诗“风作鳞之而”句而言。整理者却标点成：别本之“而”作“文”，披误甚。真令人不知所云。

第198页《思王逢原》注14：今窃食之诗，作于逢原既亡之后……“窃食之诗”指王安石《思王逢原》，诗末为“安能久窃食，终负故人期。”整理者却标点成：今窃食之。诗作于逢原既亡之后……真不知道整理者是否认真读过原诗。

第198页《登景德塔》注5：晚唐《口栖蟾》诗。栖蟾为晚唐诗僧，《全唐诗》存其诗。整理者误将人名作诗名。

如果说上述错误还可以归咎于整理者的疏忽的话，那么，下列错误就充分说明了整理者的学风浮躁和文史知识的匮乏。

第126页注4《孟子·滕文公》曰：“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整理者却标点成：《孟子》：“滕文公曰：‘士无事而食，不可也。……’”《孟子》原文中，此语为彭更所说。整理者误将《孟子》篇名阑入文中，将彭更之语误作滕文公语。

第198页《登景德塔》注4《诗·东山》：“鹤鸣于垤”。整理者却标点成：《诗》：“东山鹤鸣垤。”《东山》为《诗·豳风》篇名。整理者误将《诗经》篇名阑入诗中，又漏“于”字。

第390页《雁》注3《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埘，……鸡栖于桀……”整理者却标点成：《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埘》：“鸡栖于桀。”整理者不熟《诗经》，又不核对，随意标点，就将诗题《君子于役》改作诗句，又将诗句“鸡栖于埘”改作诗题，一诗改成了两诗。

第442页《江上二首》注5：《秦诗·黄鸟》：“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此诗出自《诗·秦风》。整理者却标点成：秦诗：“黄鸟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整理者不知此为《诗经》中诗，又误将篇名

阑入诗中。

整理者不仅不熟《诗经》、《孟子》等经典,连杜甫诗、韩愈诗、柳宗元文等名篇也不熟悉。

第119页注7:又柳子《天对》:“折筭剡筵,午施旁竖。”整理者不知柳子是李壁对柳宗元的尊称,《天对》是柳宗元的名篇,却标点成:又柳子:“天对折筭剡,筵午施旁竖。”整理者把篇名《天对》阑入文中,把两句四言句妄改成五言句了。

第127页注5《潮州谢表》云:“飓风鳄鱼,患祸不测。”至是,则为文以逐之。整理者却标点成:《潮州谢表》云:“飓风鳄鱼,患祸不测。至是,则为文以逐之。”“至是,则为文以逐之”两句为注释者所说,整理者却将此阑入韩愈文中。同页注9韩《符读书城南》诗……整理者却标点成:韩符《读书城南》诗……整理者误将韩愈作“韩符”,误将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改成了“韩符”的《读书城南》诗……

第213页《山田久欲拆》注2杜诗:“众水会涪万。”平楚,见上注。“众水”、“平楚”,皆王安石此诗中语。“众水会涪万”,出杜甫《长江二首》之一。整理者却标点成:杜诗:“众水会涪万平楚,”见上注。硬将“平楚”二字阑入杜甫诗中。

第323页《同杜使君饮城南》注3《楠树歌》:“五月仿佛闻寒蝉。”《楠树歌》即杜甫《楠树为风雨所拔叹》。整理者却标点成:“楠树歌五月,仿佛闻寒蝉。”将杜甫诗名阑入诗中,将杜甫的七言诗妄改成五言诗了。

第395页注12杜诗:“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此出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一。原注误将“殷床”两字置“杜诗”前。整理者不加思考,又不核对杜诗,却标点成:杜诗:“敖床梵放时,出寺钟残仍。”还把“殷”字误排成“敖”字。

第434页《答冲卿》注2杜诗:“破柑霜落瓜”,“瓜嚼水精寒”。前句出杜甫《孟冬》,后句出杜甫《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整理者却标点成:“杜诗:‘破柑霜落瓜,瓜嚼水精寒。’”整理者误将两首杜诗当作一首,又将“霜落瓜”误作“霜落瓜”。

第458页注8杜诗《驄马行》:“顾影骄嘶似矜宠。”整理者却标点成:杜诗:“驄马行顾影,骄嘶似矜宠。”整理者又将杜甫诗名阑入诗中,将杜甫的七言诗妄改成五言诗了。

第837页《万事》注1杜诗《缚鸡行》:“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整理者却标点成:杜诗:“缚鸡行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又将杜甫诗题阑入诗中,将杜甫的七言诗妄改成长短句了。

整理者不仅不核对典籍,随意标点,有时还更胆大至妄改原文。第549页《送质夫之陕府》注3《禹贡》:“短褐不完。”原文为“贡禹短褐不完。”贡禹字少翁,西汉人,《汉书》卷七十二有传。《汉书》本传载贡禹上书曰:“……短褐不完。”整理者不知贡禹是人名,但知道《禹贡》为《尚书》篇名,却又不核对《禹贡》本文,便自作聪明,将“贡禹”妄改为“禹贡”,将《汉书》本传所载贡禹上书妄改为《禹贡》之语。第844页《九日赐宴琼林苑作》注2更将《汉书·贡禹传》妄改为《汉书·禹贡传》。如果整理者能核对一下《汉书》,就不会产生这类笑话了。整理者在前言中,对自己的整理方式也表示了一下担心:“也许有人会说,我重蹈了明人妄改古书的覆辙,但我要说明的是:我努力地保存底本文字的原貌。”可惜的是,整理者的努力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他担心的事情却发生了。

## 五

诚如整理者所说,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错误极多,校不胜校,所以整理者将明显错讹径行改正,但是还有不少失校之处。如:

第37页《四皓二首》注6中“高祖□士”。□应为“嫚”字,原书字迹模糊,整理者也未校对他本以补上。

第54页注34中“石勤”原误,整理者失校,应作“石勒”。

第78页《吾心》注2《刘郡人物志》,“刘郡”原误,整理者失校,应作:刘劭《人物志》。刘劭,一作刘邵,三国魏人。

第95页注24《庄子·天地》篇中“抱瓮而出淮”,“淮”应作“灌”,整理者失校。

第449页《冬至》注2杜诗《除日》诗:“相与博塞为娱。”按,此为杜甫《今夕行》句,原作:“相与博塞为欢娱。”原注漏“欢”字,整理者失校,承其误。

第656页《次韵昌叔咏尘》注4刘梦得诗:“口水秋来不恐人。”口应为“峡”字,原书字迹模糊,整理者也不核对刘禹锡集以补上,此为刘禹锡《别夔州官吏》句。

此外,整理者对原书也作了一些补笺,篇幅不多,其中不少是校记,也间有发现之功。但是,确如整理者在前言中所说:“似此补笺寥寥数语,岂可与前哲争辉?称之‘补笺’,已是稍嫌不知轻重了。”有的地方不仅没有补正之处,反而把前人已注明的搞糊涂了。如:第867页《题张司业诗》是王安石的一首名作,评论唐代诗人张籍诗,诗曰:“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原注:“籍字文昌,和州人。”并引白居易《读籍诗集》、姚合《读籍诗》,指明“张司业”为张籍。张籍祖籍吴郡(即苏州),曾任国子司业,世称“张司业”,著有《张司业集》,两《唐书》皆有传。而整理者的补笺却云:“张司业,未详。据诗意,张乃苏州人。”不知整理者是看不懂前人原注,还是不同意前人观点而出此补笺。

## 六

《王荆公诗注补笺》的疏误远不止上文所列举的种种,仅因篇幅关系,就此打住。此书的疏误,可以引起我们对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是如何对待祖国的文学遗产,尤其是在古籍整理方面;二是如何坚持健康的学风。对待祖国的文学遗产应该抱着敬重的态度,因此整理古籍的首要在于存真,保留古籍的最初面貌,在没有合适和可信的整理者时,古籍整理出版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影印原本和善本。这样至少可以保留古籍的最初面貌。当然,从研究和普及的角度来说,古籍仅有影印本是不够的,为了弘扬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需要做进一步的整理,如标校、注释、今译等。但是,古籍整理是一项严肃、寂寞且又艰巨的工作,不仅对整理者的学术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且要求整理者有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而绝不能草率从事、急于求成。古代有不少毕生从事于一种古籍整理的学者,时贤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如著名学者钱仲联的《剑南诗稿校注》,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约稿。钱先生穷三年之力,于1965年完成。稿交来后,曾经编辑审阅并提出大量修改意见,为钱先生所接受。上世纪70年代末,钱先生的修改稿交来后,又经编辑审阅和作者修改,反复来往,编辑出版工作持续了五年,于1985年问世。再如宋史大家邓广铭的名作《稼轩词编年笺注》,半个世纪中多次修订,直至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增订三版,增订本字数逾60万字,篇幅比初版增加了一倍以上,增订本的编辑出版工作也达八年之久。邓先生去世前还在修订此书,在他去世后出版了最后一次的修订本。由此可见前辈严谨扎实的学风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笔者与李之亮教授相识多年,同治宋代文学,又有蒙其赠书之谊;笔者所业为编辑,从事古籍整理著作的出版,与此书的出版者为同行。之所以不避忌讳而撰写本文,正是出于对祖国文学遗产的重视和对健康学风的坚持,不仅在于纠正错误,而且也在于自警自勉。

(作者单位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宋蒙